

清末革命運動與亞洲觀的遇合： 以「亞洲和親會」為個案的討論

● 周麗卿

摘要：清末中國從「天下一家」的朝貢體系瓦解之後，如何回應亞洲、世界的新形勢，是迫在眉睫的時代課題。先前的研究多着眼於清末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較少關注其如何看待與亞洲的關係，尤其是具體的行動策略。事實上，清末中國已經形成一套亞洲觀，其重要標誌為由同盟會「東京派」於1907年成立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所主導的「亞洲和親會」，該會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志士，共同抵抗西方與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面對中國內部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亞洲和親會以宏觀的視野，以一種獨特的亞洲地緣政治觀，來處理弱種與強種間的國際關係，追求一種民族平等生存的權利。在中國朝貢關係解體之後，亞洲和親會透過民間自發性的力量，以平等為基礎，尋求弱國與弱國之間的聯合。雖然該會產生未久即因中日官方政治勢力的介入而消亡，但仍可以作為理解清末中國亞洲觀發展的重要支點。

關鍵詞：亞洲和親會 社會主義講習會 同盟會「東京派」 帝國主義 清末革命

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譯介掀起第一波傳播熱潮，主要透過留日學生經由日本的中介，並與當時日漸澎湃的革命運動相結合，社會主義思潮成為傳播「革命」的思想論述資源。這與清末中國受外來民族的壓迫，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息息相關。因清廷的無能與對改革的敵意，使得排外、反強權的浪潮反過來成為國內排滿革命的根源，革命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強權實際上互為表裏。

清末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引介，其代表為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東京「社會主義講習會」（以下簡稱「講習會」，該派又稱為「東京派」）與巴黎《新世紀》成員（該派史稱「《新世紀》派」，又稱「巴黎派」）的社會主義思想。1907年，講

習會成員主導下成立的「亞洲和親會」，則進一步加入「反強權」與「互助平等」的思想成份。亞洲和親會的成立，與「東京派」對中國政局及革命運動的檢討有關——國族政治問題不在滿人異族政權，而在於集權化的國家政治制度。因此，筆者通過梳理清末同盟會「東京派」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其革命實踐之間的具體聯繫，進而考掘此時「東京派」主導的亞洲和親會是中國革命與亞洲政治環境互動的行動策略結盟，並且「東京派」對於「革命」與「亞洲觀」的理解高度，將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晚清的革命問題與「亞洲意味着甚麼？」在清末的發展。

一 革命運動的本質思考：同盟會的分裂

1907年，孫文離日之際，因受日本政府饋金一事未經眾議，以致遭受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人的強烈反對。關於饋金問題，眾說紛紜，有的持日本受清廷之託一說^①，有的持日本浪人居中斡旋的看法^②。不論實情如何，餽金事件已經凸顯出以孫文為主的革命派與章、張、劉等人在面對日本政府的取態上有所歧異。日本在當時是對中國存有威脅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但孫文一派認為並不存在帝國主義的威脅，相反，他們極力爭取這些國家朝野的支持；在章、張、劉等人看來，仰賴外力莫若自力更生，從科學和哲學兩方面去尋求系統的革命理論，以喚起群眾的覺醒。從後一種願望出發，一大批革命者走上了研究社會主義的道路^③。後來，劉師培、張繼等人自立門戶，於1907年在東京成立講習會^④，並由劉師培妻何震出面創辦《天義》報。《天義》報實際上即為講習會的機關報。

1906年底，孫文發表於《民報》的演說辭：「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裏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⑤，表達了他對民族民權問題處理的急迫性優於民生主義的看法。如果我們將孫文此一演說辭再與1907年「東京派」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加以比較，不但能揭示革命黨人此時對革命觀點的歧異，之後革命黨人的分裂也由此可見端倪。

1907年6月和8月，「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分別刊載於《天義》報與《民報》。其時劉師培為《天義》報主筆，張繼、章太炎則為《民報》的主編，廣告有云^⑥：

近世以來，社會主義盛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間倡民族主義，然僅辨民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於此，慨社會主義之不昌，擬搜集東西前哲諸學術參互考驗，發揮光大以餉我國民，又慮此學之不能普及也，爰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此旨。

末了署名張繼、劉光漢（即劉師培）^⑦。張、劉認為「僅辨民族之異同」，只提倡民族主義的排滿思想，只是漢人代滿人掌握政權的排他思想，衍生的後果是以一專權代替一專權。因此，講習會廣告中的「以暴易暴」觀點，主要批判

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所構築的新政府，仍是少數特權階層；就保存「國家權力」來看，專制、君主立憲或共和立憲，其實並沒有區別。

事實上，孫文演說辭對民族主義的主張，如「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漢人〕的國」^⑧，仍是強烈的大漢中心主義。在同盟會綱領中，「驅逐韃虜」與「恢復中華」並列^⑨，而此處的「中華」，盡人皆知是指漢族的中華。然而，「東京派」與「巴黎派」分別就大漢中心主義的自我膨脹與漠視他族的存在加以反省^⑩，指出這對於未來建立的「民國」必定產生不良的影響，即無法在真正族群融合下建立共和。最重要的是，「東京派」採取農工貧民的視角來看待革命的問題，這也與他們認為革命是全民革命的立場有關^⑪；而孫文則取革命黨人行革命、傾向菁英革命的觀點，因此批評「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⑫。

當時，孫文的國家社會主義立場受到喬治 (Henry George) 的影響^⑬，帶有西方社會主義福利政策的觀點；而「東京派」的社會主義觀點主要受到日本社會黨的影響^⑭，尤其是主要領導人幸德秋水，當時在革命黨及留日學生之間產生了巨大影響^⑮。要明瞭此時他們何以進一步聯合組織一個新的亞洲地緣政治團體——亞洲和親會，在此必須先透過兩條線索的鋪陳——日本社會黨與中國革命黨之間的聯合協作，以及彼時日本亞洲觀的發展脈絡，方能有助於我們釐清清末中國亞洲觀的理念與行動策略。

二 亞洲革命聯合的醞釀：亞洲和親會的發展緣起

如前所述，劉師培、張繼、章太炎等人因饋金事件與孫文交惡，因而想要從社會主義尋求一種系統的革命理論，以喚起民眾的覺醒。不久之後，劉、張等人即拜訪當時日本社會黨重要人物幸德秋水^⑯。幸德秋水曾在《平民新聞》撰文，表達與中國革命主義者聯繫的期待：「社會黨運動是國際運動，無人種與國境區別。我認為日本和中國的關係與德國和俄國的關係也很相似。因此，中國革命主義者與日本社會運動者攜手合作之日，為期不遠……」^⑰

在此我們先略為說明當時日本社會黨的情況。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府是一權力集中、專制的政府。對明治維新產生的不滿，首先表現為由思想家、政治家中江兆民發軔的自由民權思想，並由自由平等的原理發展到批判帝國主義，進而與國家權力對立，主張擴大貧民的反抗權；基本上此一脈絡由幸德秋水所繼承^⑱。當時日本的社會黨，由於幸德秋水自美歸來後產生的立場轉變——信仰無政府共產主義，因而分裂為軟、硬兩派。硬派否認所謂的代議政體和議會政治，提倡直接行動論，與軟派等社會黨議會派，主張單純利用議會政策來進行社會改革形成對立^⑲。其中硬派成員即是未來亞洲和親會的成員。從日本社會黨硬派批判國家權力的主張，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講習會廣告中視排滿革命為「以暴易暴」的觀點^⑳。因此，劉師培提出的無政府主張：「故吾輩之意，惟欲於滿洲政府顛覆後，即行無政府，決不欲於排滿以後另立新政府也」^㉑，即是相應於此一命題的思考。

此外，日本社會黨人抱持無種界、無國界的觀念。幸德秋水說：「我雖為日本人，對於本國人，宗旨相異者，視之為敵，對於外國人，宗旨相同者，亦視為至親之友，並無所謂國界也。」²²在幸德秋水思想未轉向無政府共產主義之前，他已提出亞洲的革命聯合主張：「中國革命主義者和日本社會運動者的攜手合作，為期當不在遠。正像歐洲各地的社會黨幾乎已經聯成一體、展開共同活動那樣，亞洲各國的社會黨也必須結成一體，進而向全世界推進革命運動。」²³

在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官方日益盛行「脫亞入歐」論²⁴，儼然步歐美後塵，形成東亞的帝國主義霸權。這與幸德秋水所持的道德互助論——以固有之道德互相扶助、以信義相交的精神背道而馳²⁵。在此形勢下，他參與亞洲和親會的發起²⁶，以「道義」而不以「功利」，作為國家之間、志士之間聯合的基礎。而「東京派」也因幸德秋水反帝國主義、反議會政治，提倡經濟平等、直接暗殺行動，但又能倡導傳統道德，認為雙方的想法相近²⁷。

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思想成為「東京派」理解西方社會主義的主要來源，但他的主張植基於日本社會特有的土壤²⁸。中日兩國不同的是，中國此時尚未因資本主義發達而產生勞動問題²⁹，因此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行動方案，呈現出來的是中國當時身為受壓迫民族產生的反強權——反帝國主義而形成的組織：亞洲和親會。

亞洲和親會於1907年春夏之際成立於日本東京，是流亡日本的亞洲被壓迫民族（如中國、印度）的革命志士以及日本的社會黨人聯合組織而成。該會的主辦人為劉師培與張繼³⁰，主要以中國革命黨為中心，入會的中國人有章太炎、張繼、劉師培、何震、蘇曼殊、陶冶公、陳獨秀等³¹。其核心由中日人士所構成：中國方面，基本上與講習會成員一致；日本方面，有大杉榮、山川均、竹內善朔等，即上文所說的日本社會黨硬派³²。

〈亞洲和親會約章〉的開頭，提出亞洲諸國，首先從印度、支那、波斯、南方諸島帶起，說明這些國家是在宗教、思想教化下的淳美之邦。基本上，從亞洲地理位置來看，已將俄國、日本排除在外。換言之，亞洲和親會的「亞洲」概念是指「弱種的亞洲國家」，強權的日俄兩國，已被排除在「亞洲」之外。

其次，亞洲和親會的義務說明如下³³：

- 一、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之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獨立自由為旨。
- 二、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
- 三、凡會員均須捐棄前嫌，不時通信，互相愛睦，期於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盡其心，共襄會務。且各當視為一己義務，以引導能助本會及表同情者使之入會；並以能力所及，建立分會於世界各國。

此會的發起，與劉師培等人當時對亞洲形勢的觀察有關，在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勢力逐漸滲透亞洲的情況下，必須聯絡各國民黨以為外援³⁴。從〈約章〉

原文來看，該會明訂「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為宗旨，並以「平權親睦」之精神，互相協助³⁵。

從上述亞洲和親會的規約來看，發起人主張在「興亞」脈絡下來振興亞洲，與日本當時帝國主義當道之下的「脫亞」理論形成強烈對比。而日本的亞洲問題，從福澤諭吉發表於1885年的〈脫亞論〉與岡倉天心1903年的〈東洋的理想〉看來，原本是各自論述的亞洲觀點，後來，「脫亞」、「興亞」交錯的亞洲觀成為日本近現代史中如何對待西方文明的立場設定問題，以及更核心的問題是回應明治日本以降，重新排列東亞國際關係秩序的內在需求³⁶。

那麼，回到清末的中國，對於長期存在「天下一家」思想的泱泱大國來說，亞洲問題的內核，就不同於曾經長期處於朝貢體系屬臣位置的日本。中國不存在「脫亞」、「興亞」的問題。「亞洲」對中國而言，制高點還不夠；中國的視角是「世界」、「天下」。然而隨着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強力叩關，衝毀千百年來「天下一家」的朝貢體系，「亞洲」視角逐漸進入到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因此，亞洲和親會即此一產物——在華（中國）/夷（外邦）的歷史脈絡中，重新透過地域：東（亞洲）/西（歐美）的視角，以西方世界的強權作為對立面，加以論述、結盟的亞洲連帶關係，以聯合抵禦外侮。

然而，對清末中國而言，亞洲問題的複雜性不僅於此。如果回溯三四百年，滿族叩關入主中原之前，中國的歷史正統基本上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朝代更迭。滿取代了漢，因此，在清末的革命運動中，民族強權又成了一個反強權的內部歷史清理問題，與反強權為基調的亞洲問題產生內外表裏關係。

三 新亞洲觀：亞洲和親會的三種帝國主義脈絡與道德立場

關於亞洲和親會的發起，我們可以參照劉師培對於當時亞洲形勢的觀察。1907年11月，劉師培在〈亞洲現勢論〉一文即開宗明義指出：「今日之世界，強權橫行之世界也。而亞洲之地，又為白種強權所加之地，欲排斥白種之強權，必排斥白種加於亞洲之強權。」針對當時的日本為虎作倀，劉師培進一步提出：「故欲保亞洲之平和，以謀亞洲諸弱種之獨立，則白種強權固當排斥，即日本之以強權侮我亞人者，亦當同時排斥。」³⁷由此看來，帝國主義強權橫行於亞洲，必須排斥白種強權與日本強權，而這裏的「亞洲」概念，透過「日本」與「以強權侮我亞人者」的類比，已將日本排除於亞洲之外。然而，更切身的問題在於，亞洲和平的維繫在於弱種如何謀得獨立。劉師培認為，此尤需兩種條件互相配合：一為亞洲弱種實行獨立以顛覆強族政府，二為與強國民黨相聯³⁸。因此，亞洲和親會的成員在抵抗強權的同時，與日本民黨合作（即幸德秋水一派）的原因在此。而「以反抗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的亞洲和親會³⁹，與孫文等人對帝國主義列強有所期待（特別是日本政府援助），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對清末中國而言，「帝國主義」意味着甚麼？帝國主義已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地圖上勢力範圍的劃分與路礦權的巧取豪奪⁴⁰。

劉師培指出歐美各國盛行帝國主義的原因在於各國權力的擴張與資本家欲擴充商業，使世界成為強族對弱族的殺戮戰場^④——以上是帝國主義的對外意涵；更為複雜的是帝國主義對內的雙重涵義：排滿、漢族「民族帝國主義」，也是「東京派」左批清廷新政與立憲派，右轟同盟會主流派的原因所在。

1906年，清廷端出「預備立憲」的大餅以饜國人，立憲派推波助瀾，提出滿人早在明代已為中國臣民的觀點，因此明朝覆滅於清，基本上是改朝換代、政權的更迭而已。這就是立憲派所謂的「中國不亡論」^④。當時針對滿人是否為中國臣民的討論，革命派與立憲派掀起大辯論，最後由劉師培提出考證詳細、無可反駁的〈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一文斷案^④。

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進一步思考帝國主義的對內涵義，關鍵在於劉師培的「排滿」之義。劉師培在此文詳細考證滿洲在明朝已為獨立之國，不為中國臣民，滿洲征服中國正意味着異族統治，尤其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必定「挾強權以實行帝國主義」^④，如此一來與英國統治安南沒有區別。該文指出^④：

滿洲當未入中國以先，既為獨立之國，則其征服中國即為實行帝國主義。……故今日之排滿，在於排滿人統治權，民族主義即與抗抵強權主義互相表裏，固與前儒中外華夷之辨不同也。……蓋彼以一族而操統治權，此以一姓而操統治權，均背於均平之旨，固不得不用其抵抗也。

劉師培義正辭嚴指出，今日的排滿與過去中外華夷之辨不同，排滿意在抵抗強權，抵抗滿洲此一「對中國實行帝國主義之族」^④。由此，劉文將「排滿」從種族主義的窠臼中提升出來，賦予「反強權」的普世價值。另外，何震和劉師培在〈論種族革命與無政府革命之得失〉中亦指出，排滿與其說是民族問題，不如說是「民族特權問題」^④。因此，「東京派」提倡的反帝國主義，並非空泛的亞洲革命聯合，而是在國內亦行反清革命，從抵抗強權、反對民族特權着眼，提出反專制與種族革命之外更具論述能力與正當性的排滿命題。

此外，「東京派」提出的無政府革命，也提供了一個批判同盟會主流派的視角。劉師培認為同盟會主流派僅提民族主義，必定貴己族而賤他族，欲使他族受制於漢族，此無異於今日漢蒙回藏等族受制於滿族，容易產生「民族帝國主義」^④。「東京派」在此觸及到一個核心問題：漢人的中華帝國心態——不容許滿統治漢，但卻容許漢統治他族——華夷之分在此「排滿」的正當性下被掩飾、遮蓋了。因此，劉師培提出：「若言無政府，則今日之排滿，在於排滿人之特權，而不在於伸漢族之特權。」^④因此，民族革命是在反對異族特權，漢、滿皆然，端視弱種對強種的抵抗，並且從弱種之間彼此的互相協助出發，才能達成亞洲的革命聯合。亞洲和親會即此一思想下的產物，其本身蘊含了雙重內涵：既回應中國民族主義的排滿問題，又具世界主義的性質，提出以「仁義」取代「功利」，主張亞洲弱種的聯合。這裏有兩條線索交織成此一理想的付諸行動，與「東京派」承自幸德秋水的思想及回應當時的革命問題有關^④。

幸德秋水認為東方革命者須改造人格，去除追逐名利之心，方能養成高尚的人格。王汎森認為，幸德秋水思想中對於道德社會的追求，正是他日後走向批判帝國主義的原因。同樣是二十世紀前期闡述帝國主義的作品，列寧

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重視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而幸德秋水作於1901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關心道德問題遠勝於經濟剝削問題^⑤。幸德秋水的道德觀點提供中國革命者的正是與當時歷史情境相呼應的道德問題。同時期的「巴黎派」指出自滿洲賞舉人進士之例一開，留學生多受其籠絡，因此擔心「恐徒有作官者，而無真誠之革命黨也」^⑥。「巴黎派」代表人物、《新世紀》主筆褚民誼也指責一些革命份子熱衷於功名利祿，嚮往「新政府之大統領」、「開國元勳」^⑦。「巴黎派」與「東京派」不約而同，均強調革命的「真誠」，他們認為做事只當計「公理」，不當計「利益」，革命是為世界生民計，而不是為一黨一人計^⑧。「巴黎派」更提出「以教育為革命」的主張，喚起人民的「公德心」^⑨。我們唯有從此一道德取向才能理解他們批判的是當時革命黨、留學生的利祿之心。

此外，當時他們從無政府共產主義創始人克魯泡特金(Petr Kropotkin)的《互助論》體會相互扶助的真理，與中國當時作為弱國，飽受西方強國以天演進化論為理論根據肆行擴張的欺凌有關。進化論強調生存競爭，以功利主義為目的，國與國之間成為弱肉強食的殺戮戰場；而克氏發明此一互助真理，希望締造世界的真和平，又與中國傳統思想中以王道而不以霸道的仁義與濟弱扶傾思想相符合。因此，「東京派」的主張可說是結合傳統思想與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更暗中點出了革命黨的道德與利益問題；而亞洲和親會的主張——以「仁義」取代「功利」，正是此一思維下具體實踐的產物。

四 小結：亞洲和親會的解體與歷史貢獻

1908年，由於講習會與亞洲和親會的主事者之一張繼因「金曜講演會的屋上演說事件」^⑩受牽連，被日警追捕，逃亡巴黎，因而亞洲和親會把亞洲的革命黨聯合成一個整體的嘗試，未能成功^⑪。同年6月因日本發生「赤旗事件」^⑫，幾乎所有無政府主義的刊物都被查禁，日本官署又對中國革命人士實行高壓手段，因而亞洲和親會在未取得成效之前即自行解體。時隔兩年，日本又發生「大逆事件」^⑬，明治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進行更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幸德秋水亦於次年(1911)被處死，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進入前所未有的消沉期，使得中日民黨之間的協作被迫中止。其後講習會內部亦發生分裂，劉師培與章太炎失和，劉師培投靠清廷官員端方，留下污名，此一批判革命黨內部的反省聲音逐漸邊緣化，未獲主流革命黨接納，以致未能形成內部普遍的反省意識。

儘管如此，亞洲和親會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明確提出「反抗帝國主義」的團體。它透過西方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進一步處理中國從八國聯軍、拒俄運動、日俄戰爭以降，因外來入侵引發內部革命風潮所纏繞的三種帝國主義：排滿、漢族「民族帝國主義」、西方帝國主義(包含日本)相關命題。

上述命題的展開具有歷史意義。首先，亞洲和親會不但致力解決中國內部的多重矛盾，更直接面對世界，尤其是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問題，並且相較於同盟會主流派，他們不傾向從日本及西方國家得到援助(諷刺的是，稍後

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人士的鎮壓，理由在於中國共和革命正是對日本天皇國體的破壞^①。這說明「東京派」其實是以宏觀的視野，以一種獨特的亞洲地緣政治觀，來處理弱種與強種間的國際關係，追求一種民族平等生存的權利。

其次，從亞洲和親會「東京派」成員展開的相關批判看來，其實已經觸及同盟會主流派的核心問題——中華帝國的思維，漢帝國中心觀的再現，華取代表（滿）成為重新掌權者——此一思考其實說明了真正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滿族統治，而是如何去除集權化的國家制度。從追求民族平等生存、去除集權化的國家制度看來，「東京派」面對的亞洲問題實是與清末革命運動、民族自決、世界主義等思考環環相扣，而亞洲和親會實為此一思考下的實踐產物。

從上述的討論看來，清末中國雖與日本亞洲意識的發展淵源相同，都是在被壓迫的歷史情境下，為抵抗西方列強而生，但其後中日兩國的亞洲觀走向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②。清末中國從「天下一家」的朝貢體系進入近代世界，並無日本的「脫亞」思想；即使在「興亞」此一脈絡下，中日兩國亦各自有不同的發展面貌。日本持「興亞」思想的活動家分為左、右兩翼：左翼知識份子主張以中日合作為核心，聯合亞洲各國共同抵抗西方列強入侵；右翼則堅持大陸擴張政策，自以為有資格領導亞洲^③。然而，左翼份子（如幸德秋水）對於西方社會主義的接納是在世界主義的層次而迴避了民族主義的內核，使得對亞洲問題的思考，後來是以右翼的形態得到繼承，最後滑向帝國主義^④。而清末中國的亞洲和親會雖然是從日本社會黨幸德秋水的這一譜系得到思想與論述的資源，但因「排滿」的民族主義內核是急需梳理的革命問題，因而亞洲和親會回應「強權」的脈絡更加複雜，而與日本亞洲觀有所區別。

1919年，歐戰結束，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前後，李大釗發表了〈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⑤，批判日本以亞洲門羅主義的方式展開「大日本主義」^⑥。1924年，孫文應邀發表有關亞洲問題的演說〈大亞洲主義〉^⑦，指出欲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須以「仁義道德」為基礎的王道文化，與殖民主義的「霸道」邏輯相對立^⑧。雖然1907年「東京派」的亞洲和親會與1919年李大釗、1924年孫文發表文章、演說時所面對的具體歷史情境各有不同，因應之道亦有其分殊，但他們所體現的世界主義、民族自決、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的核心精神，卻是一脈相承。其中，亞洲和親會與1924年孫文的亞洲觀，更不約而同地吸取傳統「王道」、「仁義道德」的思想資源，作為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

註釋

① 張玉法指出：「日政府受清廷之請，逐孫中山出境，並贈程儀五千元，日商鈴木久五郎亦餽贈一萬元，以示好感。」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474。

② 竹內善朔指出，當時側聞此事是經過犬養毅等人的斡旋。參見竹內善朔著，曲直、李士苓譯：〈本世紀初日中兩國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348。

- ③⑦ 竹內善朔：〈本世紀初日中兩國革命運動的交流〉，頁348；345-46。
- ④ 章太炎雖非講習會成立的主事者，但他積極支持並參與張繼、劉師培成立的講習會。
- ⑤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20日），頁7。本文收錄孫文、章炳麟等人的演說辭。
- ⑥ 參見《天義》，第2卷（1907年6月25日）；《民報》，第15號（1907年8月25日）。另參見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載《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380-81。
- ⑦ 劉師培於1903年到上海，為章太炎的學養及革命熱情所吸引，甚至將自己的姓名改為光漢。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99-200。
- ⑧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頁3、5。
- ⑨ 同盟會的綱領是「驅逐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參見馮自由：〈中國同盟會史略〉，載《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頁284。
- ⑩ 「巴黎派」的主張，參見民（褚民誼）：〈伸論民族民權社會三主義之異同再答來書論新世紀發刊之趣意〉，《新世紀》，第6號（1907年7月27日），頁3-4。
- ⑪ 另外，「巴黎派」也有類似的批評，如褚民誼指出，社會主義並非與民族民權主義背道而馳，而是稍有異同，有民族民權主義之作用，而無其自私自利，能為貧民計。參見民（褚民誼）：〈伸論民族民權社會三主義之異同再答來書論新世紀發刊之趣意〉，頁3-4。
- ⑫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頁9。從孫文演說辭的語意脈絡來看，歐美社會黨之所以提倡社會主義，是文明進步、貧富不均所產生社會問題的惡果，但中國文明程度不高，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 ⑬ 喬治（Henry George）為美國十九世紀末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和經濟學家，提倡徵收地價稅歸公共所有，廢除其他稅收，並提倡公用事業公有化，使社會財富趨於平均。因此其主張被稱為「單稅社會主義」。孫文的民生主義尤其深受喬治的影響，詳細的討論參見夏良才：〈論孫中山與亨利·喬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頁38-55。
- ⑭ 「東京派」所成立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其形成與發展深受日本社會黨的影響。詳細的討論可參見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會與日本思想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3期，頁138-49。
- ⑮ 周作人指出：「……《資本論》，因為是經濟立腳，一般的青年學生都感覺不易懂，倒是不大科學的，多有空想無政府共產主義比較的更有吸引力，因此幸德秋水（傳次郎）和大杉榮的勢力，在學生中間也就比堺枯川為大……」周作人：〈魯迅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十冊，〈八十心情·自敘·懷人·記事〉（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228-29。
- ⑯ 從章太炎、張繼寄給幸德秋水的明信片看來，日期為明治四十年（1907）3月26日，即講習會成立的前夕。參見石母田正著，李士苓譯：〈辛亥革命與幸德秋水〉，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二輯，頁332。
- ⑰ 幸德秋水：〈自大久保村〉，《平民新聞》，第66號，1907年4月4日。轉引自富田昇著，張哲譯：〈社會主義講習會與亞洲和親會——明治末期中知識界人士的交流〉，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二十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233。
- ⑱ 加藤周一著，葉渭渠、唐月梅譯：《日本文學史序說》，下冊（北京：開明出版社，1995），頁261。
- ⑲ 硬派代表有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等，軟派代表有片山潛、西川光次郎、田添鐵二等。參見竹內善朔：〈本世紀初日中兩國革命運動的交流〉，頁348。
- ⑳㉔ 參見富田昇：〈社會主義講習會與亞洲和親會〉，頁238；246。

- ⑲⑳ 劉師培演講詞，參見〈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錄《天義報》附張）〉，《新世紀》，第22號（1907年11月16日），頁4。該文原載於《天義》，第6期（1907年9月1日）。
- ㉑ 幸德秋水演講詞，參見〈續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錄《天義報》附張）〉，《新世紀》，第25號（1907年12月7日），頁3-4。
- ㉒⑳ 石母田正：〈辛亥革命與幸德秋水〉，頁330；337。
- ㉓ 所謂「脫亞入歐」論，最早以福澤諭吉為代表，主張把日本這一亞洲國家從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離出來，符號化為可以移動的文明載體，使它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近代強國發生一體性的關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變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日本重新排列它與亞洲、歐洲的關係。相關論述參見孫歌：《亞洲意味着甚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頁23-33。
- ㉔ 幸德秋水演講詞，參見〈續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錄《天義報》附張）〉，《新世紀》，第25號（1907年12月7日），頁3-4、第26號（1907年12月14日），頁4。
- ㉕ 石母田正指出：「筆者於1940年5月訪問土佐的中村鎮時，亞洲和親會的〈約章〉尚有保存，因此推想幸德秋水當年可能與這個組織有關，後經竹內善朔氏談話證明，事實確是如此。」石母田正：〈辛亥革命與幸德秋水〉，頁337。
- ㉖⑳ 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頁204；202。
- ㉗ 在當時日本明治維新產生的資本主義矛盾日趨嚴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幸德秋水一派針對的正是擁護天皇的國家社會主義派，而提出暗殺天皇的主張與以勞動人民為基礎的總同盟罷工論。
- ㉘ 竹內善朔指出當時中國革命知識份子理解勞動問題有其奇特視角，是將其詮釋為帝國主義的壓迫問題（而非資本家的剝削），詳細內容參見竹內善朔：〈本世紀初日中兩國革命運動的交流〉，頁351-53。
- ㉙ 竹內善朔指出，亞洲和親會雖自明治四十年（1907）夏季以後即已召集過幾次集會，但由章太炎起草的宣言書卻到同年秋季方始發表。該會原在張繼、劉師培的積極倡導下籌建起來，卻把章太炎推於上位，以章的名義發表了宣言書。該會英文定名為“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這表明了該會的主張：以完成亞洲各國的革命為主旨，進而結成亞洲各國的聯合。這個會是以中國革命黨為中心，並事先和印度的同志協商後發起的。如〈亞洲和親會約章〉所述，包括了中國、印度、越南、菲律賓、緬甸、馬來亞、朝鮮和日本等國的革命黨人。參見竹內善朔：〈本世紀初日中兩國革命運動的交流〉，頁340-42。
- ㉚ 陶冶公〈跋語〉謂：「……以余記憶所及，中國方面入會者有：章太炎（炳麟）、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蘇子谷（元瑛，法名曼殊）、陳仲甫（獨秀）……及余等數十人。」參見湯志鈞：〈關於亞洲和親會（附亞洲和親會約章）〉，載《辛亥革命史叢刊》編輯組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84。〈亞洲和親會約章〉的中文本及陶冶公〈跋語〉為湯志鈞親從參加過亞洲和親會的陶冶公處抄得，當屬可信。
- ㉛⑳⑳ 湯志鈞：〈關於亞洲和親會（附亞洲和親會約章）〉，頁83-84；83、84；82。
- ㉜⑳ 申叔（劉師培）：〈亞洲現勢論（附中國現勢論）〉，載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132；120、122。
- ㉝⑳ 孫歌：《亞洲意味着甚麼》，頁25-26；46-47。
- ㉞ 劉師培認為，與強國民黨相聯，可「挫彼國政府之威，以潛消其實力」。因為這些強國民黨（指歐美日本民黨）抱持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持世界主義，必以扶弱鋤強為天職。參見申叔：〈亞洲現勢論（附中國現勢論）〉，頁125-31。
- ㉟ 早在八國聯軍侵華前兩年，也就是1898年，謝纘泰即繪一幅「東亞時局形勢圖」，警醒世人。圖旁附有一題詞：「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說明當時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參見馮自由：〈三十九年前之東亞時局形勢圖〉，載《革命逸史》，上冊，頁41-42。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憂外患交相侵逼，尤其是八國聯軍之役，更成為之後列強瓜分中國的依據。

- ④① 申叔(劉師培):〈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載《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頁82。
- ④② 飲冰(梁啟超):〈中國不亡論〉,《新民叢報》,第86號(1906年9月3日),頁53-72。
- ④③ 關於滿人是否為中國臣民的討論,詳細內容可參見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黃福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376-79。
- ④④④⑤ 韋裔(劉師培):〈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民報》,第18號(1907年12月),頁21-22;22;23。
- ④⑦④⑧ 震(何震)、申叔(劉師培):〈論種族革命與無政府革命之得失〉,載《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頁90;91;90。
- ④⑩ 德里克亦指出,此與古代政治主題注重政治的道德基礎和本國思想傳統間存在可能的密切關係。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03。
- ④⑫ 仇:〈論留學生之作官〉,《新世紀》,第19號(1918年10月26日),頁2。
- ④⑬ 民(褚民誼):〈無政府說〉,《新世紀》,第34號(1908年2月15日),頁3-4。〈無政府說〉副標題「書《民報》第十七號〈政府說〉後」,說明該文主要回應鐵錚:〈政府說〉,《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頁1-11。
- ④⑭ 燃(吳稚暉):〈無政府以教育為革命說〉,《新世紀》,第65號(1908年9月19日),頁10-12。
- ④⑮ 1908年1月,幸德秋水等組織的金曜(星期五)講演會,受到警察干擾,混亂中,大杉榮與山川均爬上屋頂進行演說而被逮捕,故稱為「金曜講演會的屋上演說事件」。
- ④⑯ 1908年6月22日,日本東京社會主義者舉行歡迎出獄同志大會,會後高舉紅旗走上街頭,遭警察鎮壓,大杉榮等十五人被補及判刑,稱為「赤旗事件」。
- ④⑰ 1910年,日本政府誣告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犯下「大逆不道,圖謀暗殺天皇」的罪名,該事件又稱「幸德事件」。
- ④⑱ 盛邦和對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作一歸納:早期表現為抵禦列強的「亞洲同盟論」和「日中連攜」思想,繼而演繹出文化亞洲主義的觀點;最後則異變為與「大陸政策」相連的侵略理論。參見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125-35。
- ④⑲ 李吉奎:〈試論孫中山的興亞思想與日本的關係〉,載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頁160。
- ④⑳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載《李大釗全集》編委會編:《李大釗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146-48、354-59。
- ㉑ 葛兆光即指出,此時李大釗已察覺日本的亞洲主義背後是「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大日本主義的別名」,儘管在表面上確實有凸顯「亞洲」而拒絕「歐美」之意。參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91-92。
- ㉒ 1924年11月28日,孫文途經日本神戶,出席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舉行的歡迎會,發表演說,主題為〈大亞洲主義〉。參見孫文:〈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01-409。
- ㉓ 對李大釗與孫文關於亞洲問題的討論,汪暉已有詳細的梳理,參見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423-35。